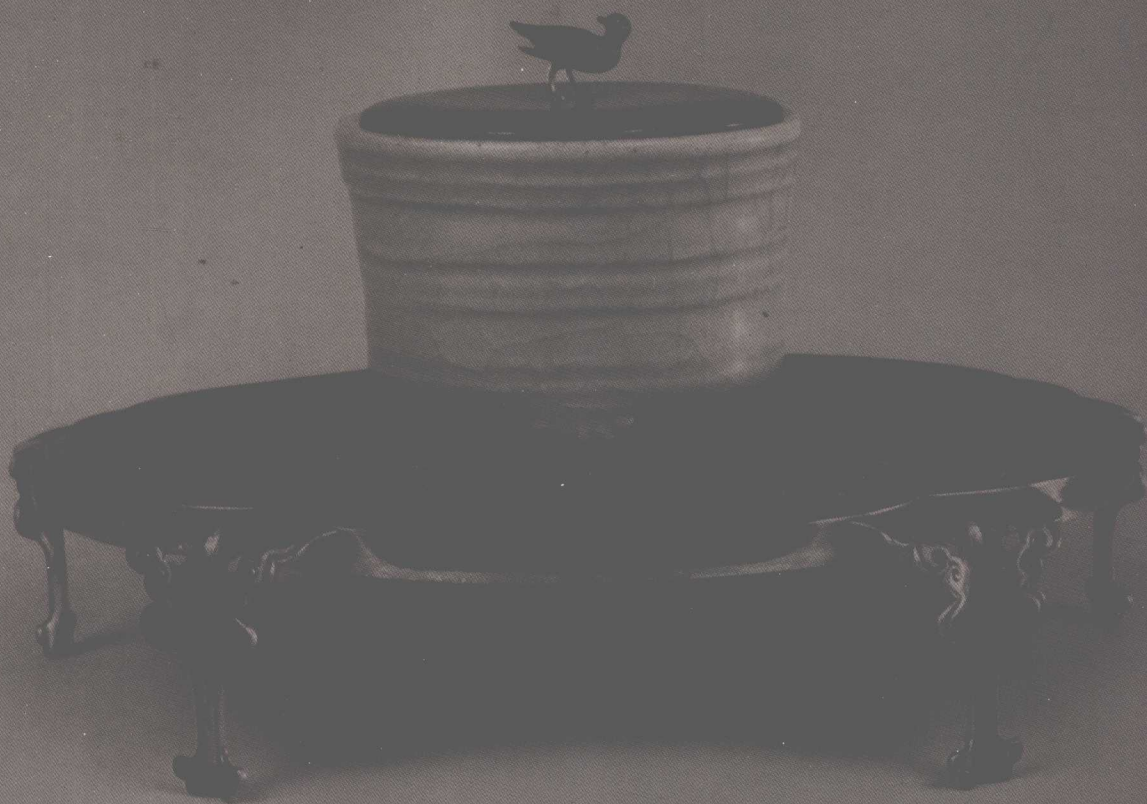




域外

何鸿 著



瓷

江西美术出版社

Zhejiang Porcelain Abroad

域外浙瓷

何鸿 著



YZLI0890129312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浙瓷/何鸿 著.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749-983-1

I. 域… II. 何… III. 瓷器(考古)—研究—浙江省

IV.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4724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

书法律顾问：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 张戈律师

域外浙瓷

作 者： 何 鸿

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网 址： www.jxfinearts.com

发 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1

印 张： 11

印 数： 2000册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9-983-1

定 价： 33.00元

中国瓷器在域外 (代序)

据《北京科技报》(2005年07月22日)报道:英国伦敦克里斯蒂(Christie's)拍卖公司2005年7月进行的“中国瓷器及艺术品”拍卖中,一款元代青花“鬼谷下山”人物罐以1400万英镑的价格成交(折合人民币2.3亿多元),创造了目前中国瓷器价格的世界最高纪录。

从18世纪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Gothenburg)商船上打捞上来的中国外销瓷,于2006年9月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展出,这次名为“瑞典藏中国外销瓷展”的展览共展出181件清代瓷器。展览结束后,捐献18件瓷器赠予北京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2007年1月,英国苏富比(Sotheby's)拍卖公司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拍卖了从越南海域打捞上来的约7.5万件中国清代青花瓷器,引起了全球收藏家的关注。这些流传海外的中国瓷器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质量上乘。

2008年4月11日,一件南宋官窑粉青釉纸槌瓶由苏富比拍卖公司在香港以6000万港币拍出,创了南宋官窑器拍卖的最高纪录。这也是目前浙江瓷器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

已故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参观土耳其托普卡普博物馆(Topkapı Palace)所藏中国瓷器时说:“此次考察,我的题目是世界各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青花瓷与托普卡普博物馆藏中国早期青花瓷的比较,不见实物根本无法想象这批青花瓷会如此精美。这批青花瓷的制作、纹饰、造型都非常特殊,青花发色比常见的青花瓷要鲜亮且细致清晰。能亲自上手,这样的机会是绝不会再有的,回国后一定要出版一系列的考察报告,这将成为各国学者研究、对比中国青花瓷生产、发展一定要引用的材料。”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古陶瓷研究专家刘新园先生也诙谐地说:“这就是寻宝嘛!景德镇还没有找到元代青花瓷生产遗存,大量文献证明当时中国最好的、最合格的青花产品都送到了西亚,这些青花瓷很多陶瓷专家会认不得,因为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么精美、特殊的元青花。”北京故宫博物院李辉炳先生也说:“不到土耳其亲眼看一看这批元青花,中国陶瓷专家死不瞑目!”

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说:“陶瓷之路是跨越中世纪东西方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①

2000余年中国瓷器史学发展和研究显示:瓷器诞生在中国,瓷器也在域外。瓷学本在中国,瓷学也在域外。

考古表明:陶器的诞生在中国已经有1万年以上的历史,而中国成熟瓷器的诞生距今约2000年。2000年来中国瓷器由创烧、发展到影响形成了世界性的瓷器现象。毫无疑问,中国瓷器的主体地位与丝绸一样为

注释:

①[日本]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胡德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此获得了代表中国 (China) 的美誉。从汉代到唐代,是中国瓷器的产生发展到成熟阶段,唐代以后中国瓷器走向精练、规模和需求的时代。唐代末年中国瓷器开始向世界发布外销信息,其后的 1000 多年,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这不仅改变了很多地区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也从科技和工业角度改变了世界陶瓷生产的格局。当然,海外的审美情趣、科技因素和生活需求也改变了中国瓷器的文化旨向和瓷性。中国瓷器若以地域划分的话,主要有这么几大瓷器体系:陕西河南河北系、浙江系窑、湖南系、江西系、福建系等。下面以这几个系统谈谈中国古瓷器在海外的出土、发现和收藏情况。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收藏情况看,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 England)、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伦敦大学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Percival David Foudation of Chinese Art, University of London, England)、剑桥的费茨威廉博物馆 (Fitzwilliam Museum, Cambridge)、牛津的亚士摩兰博物馆 (Ashmolean Museum, England)、爱丁堡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馆 (Museum of Scotland);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Musée du Louvre) 和吉美博物馆 (Musée Guimet);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U.S.A)、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弗利尔美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和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Tokyo National Museum) 等众多博物馆; 瑞典远东博物馆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土耳其的托普卡普博物馆 (Topkapı Palace) 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中国瓷器收藏。

陕西河南河北系古瓷器在域外的发现情况

陕西河南河北系古瓷器代表中国北方瓷器的最高水平。这些瓷器销往域外多半是集中在唐宋时期。可能外销的主要窑口有邢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北宋官窑、汝窑、钧窑等。自 20 世纪初以来,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的古代遗址中不断出土唐、五代的邢窑或定窑白瓷。1980 年 8 月,邢窑遗址首先在河北省临城县境内程村、解村、澄底、岗头、祁村、双井村一带发现,其中祁村窑烧制的白瓷最具邢窑白瓷的特征。根据唐代李肇《国史补》中关于“内丘白瓷瓿,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邢窑的中心窑址在内丘县境内。邢窑白瓷当时便远销海外,在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日本等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均有发现。9 世纪中晚唐“黑石号”(BatuHitam) 沉船中发现数量最大的是陶瓷制品,多达 67000 多件,包括唐代青花花卉盘、邢窑碟子、唐三彩、越窑秘色瓷以及长沙窑瓷。也就是说邢窑瓷器至迟在 9 世纪已经开始销往海外。在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 (Fustat, Egypt), 发现大量唐瓷碎片,种类有唐三彩、邢白瓷等; 在伊朗内沙布尔 (Neyshābūr) 遗址,发掘有 9 世纪后半叶至 10 世纪前半叶唐朝邢窑产品。官、哥、汝、定、钧等窑瓷器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故外销很少。耀州窑在西安北面铜川地区,以黄堡镇为

中心,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等地。此地在宋代属于耀州,故名耀州窑。该窑创烧于唐代(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以烧造青瓷而蜚声海外。宋代王存的著述《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明确记载有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载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温俊又知耀州日,遣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①的实况。耀州窑除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也远销到世界各地。目前已在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The Sultanate of Oman),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发现了宋代耀州青瓷。磁州窑系是宋金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系,以河北磁县磁州窑为中心,窑场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均有分布。磁州窑系诸窑多是综合性瓷窑,兼烧白瓷、黑瓷、彩绘瓷、三彩陶器等品种。磁州窑瓷器在国内很多地区都有出土和发现,海外还比较少见。

湖南系古瓷器在域外的发现情况

湖南各地以及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河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唐墓或唐代遗址中都曾出土有湖南铜官窑瓷器。外省出土铜官窑瓷器数量最多的是江苏扬州和浙江宁波。扬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在唐代是国际贸易港口,波斯、阿拉伯等国商人来此经商的较多,铜官窑釉下彩瓷就是通过这里走向世界各地。在东亚、南亚、西亚诸国乃至埃及等非洲国家,几乎所有唐代外销瓷出土之处,都有铜官窑瓷器出土。这些标有“天下第一”、“天下有名”的瓷器对沟通中西文化,繁荣唐代经济,提高“瓷之国”的盛名,贡献很大。1998年,一群印尼人潜水采集海参时无意中踩到一堆瓷碗,找获了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唐三彩以及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瓷器多达5万余件,占了沉船瓷器的90%以上——这艘唐代沉没在印尼苏门答腊彭加山岛附近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BatuHitam)沉船的打捞,也引发了人们对长沙窑陶瓷的极大关注。国外发现长沙窑瓷器以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伊朗较为丰富,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较少。如朝鲜的庆州和龙媒岛等处发现有长沙窑瓷器,1件黄釉褐彩贴花三耳壶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有近30个地点出土长沙窑瓷,如西表岛、福冈市、太宰府市、筑紫野市、六留米市、甘木市、冷泉、三国川町、三日月町等地。印度尼西亚多处发现有长沙窑瓷,如古突土(Kudus)、韦莱里(Weleri)、班查内加拉(Banjarnegara)、巴拉干(Parakan)、井里汶(Cirebon)、婆罗浮屠(Borobudur)、拉图巴卡(Ratu Baka)等。伊朗有10多个地点出土长沙窑瓷器,如西拉夫(Siraf)、达伊尔(Daiyer)、比比卡顿(Bibi Khatun)、沙河布杜拉(Shah Abdullah)、特勒莫拉哥(Tel Moragh)、博斯塔内(Bostaneh)等地。泰国有几个地点发现长沙窑瓷,如打瓜巴(Takuapa,即高巴)、那空寺贪玛拉(Nakorn Si Dhamaraj)、宋卡(Songkhla)遗址。菲律宾有八打雁(Batangas)、武端(Butuan)、萨马(Samar)等地点发现长沙窑瓷。斯里兰卡有曼泰(Mantai)、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等地点发现长沙窑瓷。巴基斯坦有班布尔(Banb hore)

注释:

①(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和布拉米纳巴德 (Brahminabad) 两个地点出土长沙窑瓷。阿曼的苏哈尔 (Suhar) 发现有长沙窑瓷。沙特阿拉伯的达兰 (Dhahran) 发现有长沙窑瓷, 现存英国大英博物馆。伊拉克萨玛拉 (Samarra) 发现有长沙窑瓷。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考察了该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 发现有长沙窑贴花壶瓷片。肯尼亚曼达 (Manda) 岛发现有长沙窑瓷。坦桑尼亚翁古贾·库 (Unguja Ukuu) 出土长沙窑瓷, 是 1984 年英国学者霍顿等人在此进行考古调查发现的。

以德化窑为代表的福建窑系瓷器在域外的发现情况

福建窑系瓷器主要有两大品种: 一是建窑生产的黑瓷, 以盏而闻名海外; 一是德化窑生产的白瓷为世瞩目。这两类瓷器毫无疑问都是通过泉州港输往海外的。《宋会要辑稿》中说: 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 北通朝鲜诸国”,^①已与广州、明州 (宁波) 等并列为我国重要商港。唐代以后, 陶瓷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 大量附舶, 远销海外。近年来西沙群岛发现的“华光礁 1 号”及广东阳江海域“南海一号”出土的大量德化窑瓷进一步证明了德化瓷的外销。福建晋江人李廷机曾谈到: “弟生长海隅, 少时尝见海禁甚严, 及倭江后, 始弛禁。民得明往, 而稍收其税以饷兵, 自是波恬, 或言弛禁之便, 盖以贫民籍以为生, 冒禁阴通, 为患滋大, 而所通乃吕宋诸番, 每以贱恶什物, 贸其银钱, 满载而归, 往往致富。”福建前往吕宋贸易的华商“至数万人, 往往久居不返, 至长子孙”。^②随着明嘉靖末年沿海倭患基本肃清, 明政府在隆庆二年 (1568 年) 部分开放了海禁, 准贩东西二洋。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年), 恢复广州、宁波二市舶司, 算是正式开放了海禁。明隆庆初年开放海禁以后, 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更如开闸之水不可遏止。当时仅福建漳州府月港一地, 出海者每年所贸金钱即“无虑数十万”。^③

资料表明, 日本全国有近 1000 处遗址中发现了中国陶瓷, 这其中就有福建建阳黑盏, 如黑釉兔毫纹盏、银兔毫纹盏、黑褐釉盏等。福建德化生产的明代白釉、清代青花和五彩瓷器, 被誉为“世界第一盏”的宋代黑釉鹧鸪斑曜变建盏, 就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并作为日本“文化财”国宝, 永不出境。

菲律宾人长期以来珍爱中国陶瓷, 至今出土了几万件中国瓷器, 分藏于桑托斯、洛克辛和罗伯特·维拉诺克三个馆, 藏品里就有来自福建泉州、德化的刻花青白瓷、青白褐斑瓷以及福建地区的黑瓷。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Jakarta) 收藏的 5000 多件陶瓷藏品, 有德化窑烧造的海碗、军杖、粉盒、瓶、缸等器, 也有书阿拉伯文字的三彩大盘, 这些是元末明初德化窑产品; 还有书阿拉伯文字的白地青花碗, 碗底有“成化年制”的款识, 亦属德化窑烧造之物。马来西亚是目前所知出土中国瓷器最多的地区, 沙捞越博物馆 (Sarawak Museum) 仅收集出土陶瓷标本就有 100 多万片。新加坡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搜集和保存有丰富的德化窑瓷器, 其中有高 8 厘米的德化桶形白瓷缸, 直径 14.1 厘米的明德化白瓷盏, 直径 4.6 厘米的德化印花白瓷盒, 高 11.9 厘米的德化狮头双耳白瓷瓶。

在欧洲, 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有不少被法国研究学者冠名“中国白”

注释:

①(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年。

②(清代)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323《吕宋》。

③(清代)乾隆年间《海澄县志》卷15《风俗》。

而誉满全球的德化白瓷作品，如明代德化制瓷大师何朝宗传世精品——白釉立像观音。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陈列着商、周至明清陶瓷的中国馆。在俄罗斯、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瑞典、葡萄牙等国也都藏有德化日用器、玩具瓷、宗教瓷等大量白瓷。在沃尔克所著《瓷器和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和《1683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日本瓷器贸易》中，对荷兰与“中国白”瓷的贸易进行了详细研究。表明欧洲各国早在16世纪初期就已经在使用福建瓷器。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年)曾到达泉州港，在游记中写到：“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音译为德化戴云)，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①

在非洲，基尔瓦(Kilwa, Kisiwani)岛的大清真寺遗址、苏丹(The Republic of the Sudan)墓地都出土过德化窑清代的青花瓷器，有些还被寺院镶嵌在庙宇建筑或墓柱上做装饰。

浙江窑系和江西窑系瓷器在域外的发现情况

浙江窑系和江西窑系瓷器是贯穿中国瓷器2000年的重要代表。可以说，在世界上有收藏瓷器的地方，就会有浙江窑系和江西窑系的瓷器。浙江是中国瓷器的策源地，汉季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瓷器；江西则将中国瓷器推向了世界瓷业的巅峰，创造了种类多样、工艺精湛的瓷器形态。浙江瓷器从品种上看主要有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主要以青瓷为主。江西窑系的瓷器复杂得多，从汉季开始冶陶，到宋代开始引起瓷业界的关注，至清代达到巅峰。江西景德镇瓷器从元代以后的700余年统治着中国瓷业江山。

浙江窑系瓷器

越窑青瓷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发现。越窑瓷器的输出路线，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销往日本和朝鲜的商路；一是从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至非洲东海岸。史实和考古资料证实，越窑青瓷主要是沿着“海上陶瓷之路”输往世界各地的。如在日本鸿胪馆遗址、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立明寺、平城京遗址、于治市、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都有出土。唐宋时期输入日本的越窑器，不仅发现了许多完整器和大量的碎片，而且相对年代可考。如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发现的晚唐青瓷盂，奈良平城京出土的青瓷器耳壶，京都市后京区御室仁和寺园堂遗址出土的青瓷盒，宁治市大番御藏山西麓发现的青瓷壶，经考证为北宋初年输入。日本出土的龙泉青瓷，从出土的器型和釉色、纹饰分析，当以北宋和南宋为多，器型以盘、碗为多。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忠清南道公州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四耳壶、六角壶等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泰国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Chaiya)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瓷器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Mysore)、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

注释：

①[意大利]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

青瓷。

考古证实,在斯里兰卡迪迪伽马遗址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①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青瓷。印尼也有大量中国瓷器出土,印尼全境几乎都发现了青白瓷,它的数量仅次于青瓷。20世纪以来的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Jawa)、苏门答腊(Sumatra)、苏拉威西(Sulawesi Utara)、加里曼丹(Kalimantan)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巴基斯坦的布拉米纳巴德(Brahminabad)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Karachi)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青瓷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阿曼的苏哈尔(Sohar)20世纪80年代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Balin),五六十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古名萨那威),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伊拉克出土有唐越窑青瓷、五代越窑青瓷等。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他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

龙泉窑是在五代、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外销青瓷窑口,龙泉窑外销青瓷在中国瓷器外销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宋代,中国瓷器出口开始迅速增加,遍及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和非洲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所提到的从中国直接进口瓷器的国家和地区就有几十个之多,转口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应远过此数。^②宋瓷出口的品种主要有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窑的青瓷、磁州窑的黑瓷、越窑的划花器,以及广东和福建等地的青瓷和青白瓷产品等。宋代与海外进行瓷器贸易的国家有:日本、朝鲜、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等。

南宋官窑因其特殊性,故直接出口外销的基本没有,现收藏在海外尤其是日本、英国等地的这些精美的官窑瓷器多是1860年殖民主义入侵后陆续被掠夺过去的。这是中国文物非法外流伤心史的开始。

江西窑系瓷器

江西窑系的瓷器主要有两个中心,一是吉州,一是有“瓷都”之称的景德镇。吉州窑以“黑瓷”为人称道。景德镇则从宋代的青白瓷到元代的青花瓷,从明代的单色釉瓷、斗彩、五彩到清代的粉彩、珐琅彩瓷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景德镇的瓷器自陈以来“名”天下,唐代出现了作

注释:

①[菲律宾]庄良有《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2002年,第260—264页。

②《诸蕃志》2卷,[南宋]赵汝适撰,约1225年成书。作者为提举福建路市舶官,闲时常翻阅外国地图,访问外国客商,从他们那里得知各国的国名、风土人情、风俗物产等。上卷叙述亚、非两洲共57国的地理及其与宋朝的关系。下卷叙述47种外国物产,如香料、宝石、珍珠、动植物等。

③(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

为朝廷贡品的“假玉器”，到宋代“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①。但唐代陆羽倡导的“青则益茶”的瓷器审美观念，使得素有“千峰翠色”之称的越窑青瓷遮掩了同时代诸多瓷器的光芒。宋代虽然亦盛行“斗茶”之风，但“陶业咸受王室保护”的大好形势，使得许多瓷器得以亮世。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景德镇以“体薄而润”的青白瓷独揽朝野。尤其是“景德”易名，更加奠定了景德镇瓷器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西方人更是称颂景德镇的宋代为“瓷器成功的时代”。

宋代以后，景德镇的瓷器日益为人们熟知，也受到了文人雅士的欣赏和赞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人生活的内涵。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唐一代，几乎美好的形容词都已为青瓷和白瓷独揽。人们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邢窑白瓷“像银像雪”；越窑的“青”是“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白瓷是“扣如哀玉”、“胜似霜雪”。作为兼具两者的青白瓷，的确令文人们挖空了心思。其实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也谈到唐代景德镇的霍窑所产瓷器：“色素，土善膩，质薄，佳者莹缜如玉……”清人龚轼在《景德镇陶歌》中也说：“武德年称假玉瓷，即今真玉未为奇。”以玉喻瓷，是唐代瓷器审美的重要特征。对景德镇青白瓷的赞美，以宋代词人李清照的《醉花阴》中的句子较有代表性：“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玉枕”，乃指色质如玉的景德镇青白瓷。玉之于文人，是清雅之器，与文人之品格、德性较为吻合，古有“君子于玉比德焉”^②之说。瓷之美者，类于玉焉。李清照温婉之笔调，忧郁之情思，净洁之心灵，都寓于“玉枕”（影青瓷枕）之中，犹似淡云涵润，加上“影青”寓意“隐情”，含而不露，更赋予了青白瓷诸多神秘的含义。

青花瓷器是景德镇的代表性瓷器品种，元代最为经典，明清时蓬勃发展，以白地兰花为主要特征，有“瓷国明珠”之称。青花瓷器也是对海外影响最大的景德镇瓷器品种之一。明代马欢（生卒年不详）在《瀛涯胜览》中“爪哇条”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18世纪的法国罗可可艺术（Rococo art）就曾受到景德镇青花等瓷器的影响。正像日本小林太市郎所说：“当时能提供这种充实的曲线之模范只有中国的工艺美术品。特别是柔软的瓷器的曲线……这种罗可可曲线，它保存了中国瓷器的优雅端庄气派，它含有强大的生命力。”^③日本人更称明代的青花瓷为“素肌玉骨”。^④

与青花瓷器等不同的是景德镇的彩瓷，多倾向于宫廷趣味，体现的是富贵气息，形成两种不同的格调。明清以后的彩瓷，亦非景德镇莫属。代表性的彩瓷品种有：“粉彩瓷”——有“东方瑰宝”之称。《景德镇陶歌》中说：“白胎烧就彩红来，五色成窑画作开。”“颜色釉瓷”——有“人造宝石”之美誉。经典作品有霁红和霁蓝。霁红又称“美人祭”，《景德镇陶歌》中说：“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抁烧百不同。”清高宗有御诗咏“霁青”（霁蓝）：“落霞彩散不留形，浴出长天霁色青。”清代凌汝绵《昌江杂咏》中说：“百种佳器不胜挑，霁红霁翠比琼瑶。故家盆碗无奇品，不羨哥窑与定窑。”此外，还有“斗彩”、“珐琅彩”等。这些彩瓷多以花鸟等题材装饰，以显富丽之气，呈皇室之威仪。

景德镇瓷器以其优良的品质从宋代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到明代，就像清代沈怀清所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主人，动

注释：

①（西汉）戴圣编《礼记·玉藻》。

②[日本]小林太市郎《罗可可的形成》，《美术译丛》第8期，1982年。

③“素肌玉骨”一词见于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之《陶埏》篇中：“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

以数万计，海樽山俎，咸萃于斯，盖以山同之险，兼都会之雄也。”^①从世界各地考古调查的情况看，无论是直接与景德镇有过瓷器贸易还是没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收藏有景德镇的瓷器。“镇器遍天下”，一点也不为过。

日本与朝鲜是“陶瓷之路”上与中国较近的国家，也是与中国有2000多年历史文化交往的国家，日本与朝鲜发掘了大量的中国古陶瓷。日本出土的这些瓷器现多收藏在日本出光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福岗市美术馆、浜松美术馆等地。^②清代瓷器很少发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桃山时代丰臣秀吉发动的史称“陶瓷战争”，^③给日本的陶瓷业带来了空前的繁盛，并且18世纪末以后日本瓷器（伊万里瓷器）一度取代中国瓷器而独领欧洲瓷器市场。英国人哈里·加纳（Harry Garner）在《东方的青花瓷器》（Oriental Blue and White）一书中有一章谈到了日本的青花瓷器，并言中国陶瓷对日本的陶瓷影响很大。

1976—1977年朝鲜文物管理局曾在朝鲜西南海域打捞，共发现白瓷（主要是青白瓷和枢府瓷）2280件，均为景德镇生产，这些瓷器现大多收藏在国立中央博物馆。朝鲜出土的宋代瓷器以景德镇的青白瓷数量为多。

东南亚是“陶瓷之路”的中转站和避风港，咽喉般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的显著地位，其重要性自唐代以后逐渐显现出来。就瓷器而言，据估计，仅在马六甲海峡就有近200艘15世纪以后的沉船。这就可以推测在15世纪以前，航海技术相对较落后的一段时期，在印度洋往西的海域不知道有多少航船在此航行、停泊和沉没。一船一船的瓷器，托载着多少商人的美梦和诉说着千载的艰辛与磨难。

西亚和非洲是早期“陶瓷之路”的终点，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是区别于17世纪以后这条商路的殖民性。17世纪以后在这条商路上传播的主要是景德镇瓷器。17世纪以前，景德镇瓷器输往西亚和非洲的主要是青白瓷、青花瓷（又称青白花瓷）等。在西亚，阿拉伯商人控制了大量的瓷器贸易，此外，还有中国和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精明果敢的冒险意识和不畏艰辛的探索精神，以及阿拉伯商人对中国瓷器高超的鉴赏能力是其得以主宰世界瓷器市场的重要原因。如今在土耳其收藏的世界上元青花最多的托普卡普·撒拉伊博物馆便是很好的明证。作为当时商业订件如此高质量的元青花瓷在西亚有丰厚的收藏，的确是世所罕见，就连中国本土也难以企及。在西亚，现今遗存的许多商港遗迹，默默演绎着岁月的沧桑。伊朗的席拉夫、伊拉克的撒马拉等，位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更有“通往中国门户”之称，这里曾留下了许多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友好交往和商贸往来的印迹。

当今并不发达的非洲，可在1000年前则是世界上少有的富庶之地。尤其是北非堪称“中国古瓷博物馆”，景德镇的青白瓷在宋代就曾到达此地。“有世界陶瓷片展览会”的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遗址告诉世人，当时的埃及，几乎家家户户使用过质量精美、价格昂贵的中国瓷器，这一点在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和曾经在埃及作过调查的美国东方文化调查局官员斯坎伦的报告中均可以找到充分的注解。非洲的坦桑尼亚，也是发现中国瓷器较多的地区。英国考古学家惠勒（R.E.M. Wheeler）在其《田野

注释：

①（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8引沈怀清《沈怀清记》。

②刘兰华《宋代瓷器和对外贸易》，《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③日本在江户时代（1603—1867）就成为了青花王国的属国，这种说法在当时并不夸张。江西景德镇境内有一座珠山，日本也将一座小山命名为“珠山”；景德镇有一座龙珠阁，日本也仿建了龙珠阁，这个时代还是以向朝鲜发动的两次“陶瓷战争”为发端。

考古学》(Field Archaeology)一书中谈到坦桑尼亚的考古时说:“我认为公平地说,就中世纪而言,从10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

明清以来,景德镇瓷器全面发展,无论是瓷器生产规模、品种、数量还是瓷器质量、外销力度均居世界前列,从而迎来了中国瓷器史上最辉煌和巅峰的时刻。清代刘子芬的《竹园陶说》中说:“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在瓷都景德镇,人们见到的是传教士登退科尔笔下的“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明代缪宗周《兀然亭》诗中描绘“陶瓷之路”上“舟帆日日蔽江来”的船只也在传诵着“瓷都”景德镇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的瓷器传说,正是基于此,中国瓷器最后的一抹夕阳也在景德镇的上空画了一个美丽的圆弧。回眸一瞥,历史总是在起伏中蜿蜒向前。

毫无疑问,中国瓷器对外输出,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欧洲对中国瓷器狂热崇拜。有资料显示,在18世纪的100年间,中国输入欧洲的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宗教绘画中,可以看到中国瓷器的身影。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在1514年创作的《诸神的盛宴》中就画有明代中国青花瓷盘,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的地位是很崇高的。1651年,荷兰联合省执政弗雷德莱克·亨利(Frederic Henry)的女儿嫁给德国勃兰登堡(Brandenburg)选帝侯,嫁妆就是一大批中国瓷器。而1662年英国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年)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也带来了瓷器作嫁妆。17世纪初,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 1660—1731年)形容当时的“中国热”说:“女王本人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东西。”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年)更是于1670年突发奇想,在凡尔赛建了一座“中国宫”。整个中国宫的装饰是“中国风格”和“中国情调”。檐口楣柱、墙角四边屋顶都贴着艳丽的瓷砖。室内色彩模仿中国的青花瓷器,白底加蓝色的图案,摆上中国的瓷花瓶、绸帐与金流苏。至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疯狂的“中国热”。1792年,英国外交官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3—1806年)在其日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造。”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痴迷不亚于中国布。英国学者简·戴维斯(Jane Davis)说:“皇家或贵族是否占有东方瓷器或者后来的欧洲瓷器,关系到他们的声望。瓷器增加宫廷的光彩。”“几乎整个18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①1712年,一位名叫昂特雷科莱(汉名殷弘绪)的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景德镇传教。经过他多年努力,终于将景德镇瓷器工序及配方的秘诀传回法国,从而使欧洲瓷器生产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法国在18世纪中叶烧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硬质瓷器。法国人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Louis Sebastien Mercier, 1740—1814年)记叙18世纪初中国瓷器的情况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糕。”^②

注释:

①[英国]简·戴维斯著,熊寥译,《欧洲瓷器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

②[法国]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毛凤支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8月。

两广窑系瓷器

两广瓷器，主要是指广东、广西为代表的南方瓷器系统。历史上，广东著名的窑口主要有：西村窑、潮州窑、广窑、惠阳窑等。广西主要有永福窑、藤县窑、容县窑、兴安窑等。广东依靠优良的海港优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商港的南大门，也是通向海外各国的必经之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的起点之一，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瓷器输往世界各地。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广东瓷器从唐代开始就已输往海外，清代达到高峰。广西瓷器在外销方面相对要弱势一些，东南亚有一些零星发现。杨少华在《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略述》中谈到：“广东唐代生产外销瓷的窑场，目前所知有潮州北郊、新会官冲、梅县水车……”又“潮州港是当时粤东地区的对外贸易港，据《全唐文·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记载，唐德宗时，潮州已有‘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从事贸易活动……近年文物普查，在汕头澄海县凤岭古港和程美古港遗址发现有大船桅、大缆绳，并散布有众多的宋代瓷片，都反映了唐宋时期外国商人到潮州贸易和瓷器在潮州港输出的事实。梅县水车位于梅江边，与潮州水路交通便利，通过梅江可达潮州。梅县水车窑和潮州北郊、笔架山等窑的产品，应是从潮州港输出的”。韩槐准（1892—1970年）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中说：“当时（清代）广州商行亦为欧洲贾舶定造釉外彩之五彩或三彩瓷器，其素瓷多由景德镇烧成运到广州后，广州商行乃依欧人之习惯及好尚，有时专用欧人之稿本或军团之军徽，其花纹全属欧化，有时其花纹半中半西，有时习以中国画谱，由广州之瓷画手以珐琅彩及泥金，绘画于素瓷上，炉烧而成釉外五彩或三彩，而供给与欧洲的。”冯先铭（1921—1993年）在《中国古陶瓷图典》阐述：“梅县窑产品在墓葬中屡有发现，梅县唐代属潮州管辖，潮州在当时是一个繁荣的对外港口，梅县水车窑的产品不仅内销，而且远销到泰国、日本等亚洲一些国家，上述国家均出土过梅县窑产品。”

总之，中国作为世界瓷器的发源地和重要的瓷器生产、出口国家，不仅将品质优良、数量巨大的瓷器销往世界各地，同时也吸收世界文化的先进元素丰富自身；一方面丰富了瓷器输入地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精神文化品位。中国陶瓷的输出，将中国陶瓷技艺传播到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和促进了世界陶艺的发展，这种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何鸿 己丑孟春于西子湖畔

目 录

中国瓷器在域外（代序） /1

第一章 浙江人发明瓷器 /1

第一节 国际文化语境中的“瓷器” /1

第二节 瓷器与浙江 /3

第三节 浙江瓷器名品 /6

第二章 浙江青瓷的域外传播 /24

第一节 浙江青瓷的外销背景 /24

第二节 浙江青瓷的外销港口 /32

第三节 宋代以前浙江青瓷的外销 /37

第四节 宋元明清浙江青瓷的外销 /45

第五节 近代以后浙江古瓷器的域外传播 /54

第三章 浙江青瓷的域外影响 /87

第一节 浙江青瓷的“世界视野” /87

第二节 浙江青瓷的世界影响和贡献 /94

第四章 域外中国瓷器的研究 /110

第一节 英国的中国古陶瓷研究 /110

第二节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 /116

结语 /129

《域外浙瓷》附录 /130

附录一：浙江瓷器发展简表 /130

附录二：我国历史朝代与公元对照简表 /146

附录三：明、清朝代建元表 /148

参考资料 /149

后记 /155

第一章 浙江人发明瓷器

第一节 国际文化语境中的“瓷器”

关于“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一词的文化历史诠释,历来争议不断,也未能梳理出清晰的文脉。但我想,有一个问题应该明确的是“中国”一词作为地域和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度”是何时出现的。

从目前已知的文献看,“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大雅·民劳》中曰:“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此后,《孟子·滕文公上》中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也记载:“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周以后“中国”一词频繁使用。《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汉末学者刘熙的注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显然,这里的中国,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权“国家”,而是指京师或京都。对“中国”而言,中原汉族以外称为“四夷”,汉族、华夏族居中,称“中国”,即中央之国,是地理地域概念。西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近代郭嵩焘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①在外交文献中,最早使用“中国”一词,始见于1842年签定的《南京条约》。这时的“中国”也是指区域或全部国土。真正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出现则是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照此看来,若将“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等同,那是1911年以后的事。关于“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的渊源问题,施蛰存先生1984年著文说:“西欧人在最初见到中国瓷器的时候,大为惊异。当时他们还没有瓷器,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名字,于是以中国国名称之。这是瓷器因国而得名,并非国名因瓷器而得。况且,作为瓷器解释的‘china’这个字第一个字母是小写的,作为国名的‘China’,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区别很清楚,怎么能说支那(或中国)这个名词的意义是瓷器呢。”^②施先生还谈到:我国的外文译名,是统一用的“China”,英国、美国人读作“查艾那”,法国、西班牙等拉丁语系的国家读作“希纳”。译成中文,就是“中国”,而不是“支那”。只有日本人从前称我国为“支那”,但这也不是“China”的译音。“支那”这个名称,起源于印度。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为“脂尼”,这是见于唐以前的佛经译本中的。古代印度的“脂尼”(Chini),向东流传到日本,成为“支那”,向西从阿拉伯传到西欧,成为“希纳”。英国人又用他们的缀音读法,把中间的i读成长音,就成为“查艾那”。我们只能说“China”是“支那”的音译,不能说“支那”是“China”的意译。现在,印度还有人称中国

注释:

①(近代)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814—815页。

②陈子善、徐如麒编选《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

为“脂尼”，日本也还有人称我国为“支那”，但在公文书上，已经都不用这个旧名了。

英文“China”一词的来历，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观点是认为“China”一词的产生与公元前3世纪中国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秦”有关（英文中“秦”的翻译是“CHIN”）；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07—1661年）在1655年最早提出“China”是秦国的“秦”的译音。美国历史学家L.S.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1913—2004年）说：“中国的西方名字（China）由秦（Ch'in）而来。”^①但我们在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乔忒厘耶（Kautiliya）的《政事论》中能找到“Cina”的称呼；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有提到“Cina”。也就是说“Cina”的出现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据考证，中国的丝绸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到了印度。谭中先生认为：“China”（中国）这个词，实质上是印度发明的。印度孔雀王朝开国宰相考底耶（Kautiliya）有一本书叫Arthasastra，季羨林先生翻译成《治国安邦术》，这本书中有一句：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 “Kauseyam”，就是中国的蚕茧。据梵文古籍记载，印度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Siva）非常喜欢穿黄色蚕茧的丝织品。“cinapattasca”是指“成捆的（中国）丝”，“cinabhumijah”是指“产生在中国”，上面这句话中有两个“cina”，它是英文“China”（中国）的古字。^②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中国“China”一词基本上和瓷器没有关系，反而和丝绸有了渊源。鉴于此，上海东华大学周启澄教授通过对西方语言演变史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认为“China”（中国）一词来源于中国的丝绸。^③

一种观点认为“China”是“支那”音译。印度人把唐代的中国称为摩诃至那（Mahachinasthana）。摩诃是梵文，表示“大，伟大”，至那则是中国之国名。隋代慧苑法师在《华严经音义》中说：“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即汉国是也。”“支那”这个译音在拉丁文、意大利文、印度梵文中均写作“cina”，法语写作“la chine”，英、德、捷克等语写作“china”，“支那”即从这些词翻译而来。苏曼殊（1884—1918年）先生通晓英、法、日、梵诸文，曾撰有《梵文典》。他认为“China”起源于古梵文“支那”，初作“Cina”，用来指我华夏。^④唐代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梵文“Cina”在印度出现后，向西方传播，经由中亚到欧洲，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China”。“Cina”进入日本后，大多数音译为“支那”。日本辞书《广辞苑》（岩波书店，1955年出版）解释“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在日本，“从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期以后曾使用过”。到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人用“支那”指称中国与“唐国”、“清国”等。

《韦氏新世界美国英语辞典》指出：西方瓷器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早在明朝时，中国陶瓷产品就开始输往西方国家，波斯人称中国的瓷器为“chini”。欧洲商人在波斯购买中国瓷器，也同时把“chini”一词带了回去。后来他们又把“chini”改为“china”，并且把出产“china”的中国也

注释：

①[美国]L.S.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②谭中先生2006年11月2日在北京大学演讲“Chindian—Idealism and Realization”“中印大同——理想与现实”。

③周启澄，“SOME COMMENTS ON THE HISTORY OF SILK”，中国古代纺织研究国际学术报告会，2002年11月，浙江杭州。

④苏曼殊《梵文典》，汪树东、龙红莲选编，《苏曼殊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一并称为“China”。^①《英汉词海 The English-Chinese Word-Ocean Dictionary》中“China”词条介绍,“china”作为瓷器的涵义,是源于波斯语“chini”(中国的或中国人),由于受到“China”表示中国这种表示法的影响,产生了元音音变,由“chini”变为“china”,成为瓷器的专有名词。^②

一种是认为“china”是汉语“昌南”的音译。1004年北宋真宗(968—1022年)景德年间将昌南镇改名景德镇之前,昌南以生产瓷器扬名海外。这种观点基本不成立。

如果说“中国”(China)一词源于古印度,那“瓷器”(china)一词显然是很久以后的事。中国在公元1世纪的汉代,生产出了质地坚硬耐用的成熟青瓷——浙江青瓷。唐代以前这些瓷器开始作为礼品或赠品被带到海外,以东南亚、西亚和东亚的日本、朝鲜为多。唐代以后,“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让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欧洲等地商人接踵而来,穿梭在中国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等水域。传播了中国瓷器,也带来了外域文明。考古表明,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早就开始,在叙利亚帕尔米拉(Palmira)一座公元83年的坟墓中,曾出土中国生丝。8世纪时,伊拉克巴格达(Baghdad)有专门销售中国丝绸和瓷器的市场。阿拉伯人很喜欢中国瓷器,亲切地称它“al-s ī ni”,意思是“中国的”。

现藏德国卡赛尔(Keisel)郎德博物馆的一件青瓷碗,上有卡泽伦博格伯爵(1435—1455年)的纹章图案,是现存欧洲最早有年代标识的明代瓷器。

现存葡萄牙里斯本科特斯陈列馆(Jose Cortes)中印有曼纽埃尔一世(Manuel I, 1469—1521年)纹章的青花执壶,是中国最早为西欧特殊订货制造的外销瓷。

1604年,荷兰人洗劫了装载瓷器返回欧洲的葡萄牙大帆船“圣·卡特林号”(Santa Caterina),并将这批中国瓷器取名“Kraaksporeleint”,运往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

17世纪葡萄牙人将瓷器贩运到欧洲,英国人直接用“Chinaware”指称来自中国明朝的瓷器。“Chinaware”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翻译成“支那器物”、“中国货”、“中国器物”或是“瓷器”,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以上关于中国瓷器的点滴,希望能串成中国瓷器文化的一根线,在世界文化的海洋中如一片扁舟,能留下历史记忆中的一圈圈涟漪。关于“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的渊源,也许争论还会持续下去,但不管怎样,中国瓷器给中国和世界的影 响是巨大的,作为瓷器发源地的浙江,更是应该在世界瓷器史和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第二节 瓷器与浙江

浙江是中国乃至世界瓷器的策源地,其以青瓷独树一帜而绵延2000余年。2005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正式向外界宣布:曹娥江流域是世界青瓷发源地。这是浙江省考古专家在上虞市大园坪东汉窑址进行近两个月的

注释:

①[美国]David B. Guralnik,《韦氏新世界美国英语辞典》,William 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80年。

②王同亿主编译,《英汉词海 The English-Chinese Word-Ocean Dictionary》,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